

鸦片战争时期的中英兵力

茅海建

(军事科学院百科军事卷室)

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四二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清王朝的失败而告终。一个拥有八十万军队的庞大帝国，为什么会惨败于一支起先不过数千、后来也只有近两万人的英国远征军？笔者拟用具体数字进行对比分析，对这一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一、英国侵略军的兵力

从战争爆发到结束，英国侵略军的兵力处于经常的变化之中。

一八四〇年六月二十一日，从印度开来的英国海、陆军首先到达珠江口外。七天后，英远征军总司令懿律率领从英国和开普敦开来的舰队到达广东水域。是年八月，英侵华海、陆军兵力为：海军，战舰十六艘。其中载炮七十四门的有三艘：麦尔威厘号 (Melville)，威厘士厘号 (Wellesley)，伯兰汉号 (Blenheim)；载炮四十四门的有两艘：都鲁壹号 (Druide)，布郎底号 (Blonde)；载炮二十八门的有三艘：康威号 (Conway)，窝拉疑号 (Volage)，鳄鱼号 (Alligator)；载炮十八门至二十门的有七艘：拉呢号 (Larne)，海阿新号 (Hyacinth)，摩底士底号 (Modeste)，卑拉底士号 (Pylades)，宁罗得号 (Nimrod)，巡洋号 (Cruiser)，哥伦拜恩号 (Columbine)；载炮十门的一艘：阿勒琴号 (Algerin)。辅助船有武装汽船四艘：皇后号 (Queen)，阿特兰特号 (Atalanta)，马答加斯加号 (Madagascar)，进取号 (Enterprise)；运兵船一艘：响尾蛇号 (Rattlesnake)；其它运输船二十七艘。陆军：爱尔兰皇家第十八团，皇家第二十六团，皇家第四十九团，孟加拉志愿兵团，孟加拉工兵，马德拉斯工兵，加上各舰多带的可用于陆战的水兵等，共约四千人^①。

① 《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第九卷，第一一二页，第二二一页，第十卷，第五四五页；伯纳德：《复仇神号航行作战记》(W.D.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 1844, London)第一卷，第二二〇页。三个欧籍团均未足额，其大部兵力二千二百余名于一八四一、一八四二年到达。见《英国议会文件汇编》中国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Irish Univ. Press, 1971)第二十七卷，第六六页。

此后,兵力一直在增加。是年十月,从南美开来了加略普号(Calliope)和萨马兰号(Samarang),载炮均为二十八门;陆军又调来了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三十七团^①。次年元旦,海军舰船再增加了路易莎号(Louisa),载炮十六门,测量船司塔林号(Starling)和硫磺号(Sulphur),载炮皆为八门,武装汽船复仇神号(Nemesis),运兵船丘比特号(Jupiter)等。是时,英侵略军的分布为,舟山驻有英海军布郎底号、康威号、鳄鱼号、宁罗得号、卑拉底士号、阿勒琴号,运兵船响尾蛇号,测量船青春女神号(Young Hebe),汽船阿特兰特号;驻在舟山的英陆军有第十八团、二十六团、四十九团三个团各一部,孟加拉志愿兵和马德拉斯炮兵等,官兵共一千七百六十二人。其余皆在珠江口外^②。

在一八四一年的一年中,英侵略军兵力虽有变化,如一月底撤回了孟加拉志愿兵团的大部分,八月中又开到皇家第五十五团,但大体说来,变化不大。

一八四二年二月,在中国沿海的英侵华海军共有各类舰船二十五艘(不包括运输船)。其分布为:珠江一带有七艘^③,厦门有四艘^④,舟山有三艘^⑤,镇海、宁波有十一艘^⑥。是时,英陆军包括欧籍四个团,印度土著一个团,及炮兵、工兵、来复枪连等,共计军官二百七十名,士兵四千六百七十名(其中印度土著一千零七十名)^⑦。此后不久,英侵略军兵力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五月十五日,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三十七团(军官二十名,士兵四百名)撤离香港归国;五月十四至六月二十二日,从印度、新加坡开来三十六艘运输船,运来了马德拉斯土著步兵团第二团、第六团、第十四团、第三十九团、第四十一团,还有孟加拉志愿兵团、工兵、印度炮兵等^⑧,共计六千七百四十九名^⑨。六月五日,英皇家海军运兵船贝雷色号(Bellesile)从英国开到香港,载送皇家第九十八团八百余人,皇家第十八团、第二十六团、第四十九团、第五十五

① 《中国丛报》第九卷,第四一八页。

② 《中国丛报》第十卷,第五七页。

③ 伯兰汉号、前锋号(Herald,载炮二十六门)、宁罗得号、巡洋号、保皇党号(Royalist,载炮十门)、测量船青春女神号、武装汽船洪哥厘号(Hoogly)。

④ 都鲁壹号、卑拉底士号、钱米任号(Chameleon,载炮十门)、测量船司塔林号。

⑤ 皋华丽号(Cornwallis,载炮七十四门)、克里欧号(Clio,载炮十六门)、运兵船丘比特号。

⑥ 布朗底号、摩底士底号、海阿新号、培里康号(Pelican,载炮十八门)、哥伦拜恩号、阿勒琴号、测量船班廷克号(Bentinck)、汽船皇后号、复仇神号、西索斯梯斯号(Secostris)、弗莱吉森号(Phlegethon)。

⑦ 《中国丛报》第十一卷,第一一六、一一九页。

⑧ 《中国丛报》第十二卷,第四六至五五页。

⑨ 《英国议会文件汇编》中国,第二十七卷,第六五页。

团的缺额部分七百余人也同日到达^①，英陆军在得到这次增援后，步兵团达到十一个，加上工兵、炮兵等，总兵力在一万二千以上。是年八月，鸦片战争结束时，英海军在华舰船数为：战舰二十五艘。其中载炮七十二门的有两艘：皋华丽号和伯兰汉号；载炮五十门的一艘：复仇号（Vindictive）；载炮四十二门至四十四门的有三艘：塞利亚号（Thalia）、安度明号（Endymine）、布郎底号；载炮三十六门的有一艘：坎布雷号（Combrian）；载炮二十六门至二十八门的有三艘：加略普号、北极星号（North Star）和先锋号；载炮十六门至二十门的有十二艘：戴窦号（Dido）、哈利昆号（Harlequin）、培里康号、摩底士底号、哥伦拜恩号、基尔德斯号（Childers）、克里欧号、冒险者号（Hazard）、流浪者号（Wanderer）、黑獾号（Wolverine）、巨蛇号（Serpent）、巡洋号；载炮十门的两艘：阿勒琴号和保皇党号；载炮四门的一艘：青春女神号。辅助船有：医院船一艘，运兵船六艘，测量船两艘，木质汽船九艘，铁质汽船六艘^②。另有运输船约六十艘^③。

从以上数字可以得出变化中的英国侵略军兵力的大致情况。战争之初，英陆地作战部队四千名，加上海军舰船上的官兵三千余名，总兵力约七千余名；战争结束时，英海、陆军总兵力增加到约二万名^④。

二、清军的兵力

与英国侵略军相对抗的清军，其总兵力约八十万（八旗兵约二十万，绿营兵约六十万）。这是当时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常备军。但这一数字不能反映清军在鸦片战争战区中的实际兵力。这是因为，英军的侵扰范围仅限于沿海各省；而发生战事的范围就更小了，只是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四省。

就发生战事的四省论，其驻守清军占清军总兵力的四分之一强。广东绿营额兵六万八千二百六十三名，福建六万一千六百七十五名，浙江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五名，江苏三万八千零一名^⑤。这四省皆有八旗驻防。广州、福州、杭州、乍浦、江宁、镇江

① 《中国丛报》第十一卷，第六七六页；《英国议会文件汇编》中国，第二十七卷，第六六页。

② 伯纳德：《复仇神号航行作战记》第二卷，第五一一至五一二页。

③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文版）第一卷，第三三一页。

④ 《英国议会文件汇编》中国，第二十七卷，第六八页。

⑤ 广东绿营兵为一八四一年之数（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一九六四年版，第三册，第一三三〇至一三三二页，穆彰阿奏附表）。但该表仅列十四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未列入。此引江苏、浙江、福建绿营兵数为一八四九年之数，见《清史稿》兵志二。笔者曾将穆彰阿附表中十四省兵数与一八四九年各该省兵数相比较，发现几乎完全一致。由此可见，此引一八四九年福建、浙江、江苏三省绿营兵数与鸦片战争时期的兵数不会相去太远。

六城之驻防旗兵共约一万五千名^①。通计四省八旗绿营，共约二十二万余名。

当然，鸦片战争时期四省清军还不止此数。战事紧急，兵不足用，道光帝曾下令向该四省增援。其中福建实际上未得到外省援兵（一八四一年九月十三日，道光帝曾命江西调兵两千去福建，一个月后，又将该拨兵改调浙江^②）（注见下页），其余广东、浙江、江苏三省所得外省援兵数量、时间、撤出情况分见下列各表^③（注见下页）：

调往方向：广东

表一

命 调 时 间	调 出 省	兵 数	调 出 与 撤 离 说 明
1841. 1. 6	湖 南	1,000	一八四一年三月十五日所调湖北兵一千八百名、湖南兵一千名，原调浙江，改调广东；所调四川兵数百是齐慎赴粤。一八四一年七月十四日，奕山在广州惨败后，谎报军情，要求撤回各省调防兵，道光帝于七月二十八日同意。撤兵秩序为先湖南，后湖北、云南、四川、贵州、江西。八月二十三日，奕山奏称“征兵存留万余”。十月二日，道光帝称广东尚存外省兵五千。次年三月二十八日奕山奏称驻广东外省兵四千八百四十名中，仅留广西兵一千八百名；四川、湖北、贵州兵全撤。四月十三日，道光帝同意。七月又撤广西兵二百名，十月撤尽。
1841. 1. 6	四 川	2,000	
1841. 1. 6	贵 州	1,000	
1841. 1.27	江 西	2,000	
1841. 1.30	湖 北	1,000	
1841. 1.30	四 川	1,000	
1841. 1.30	贵 州	1,000	
1841. 1.31	四 川	1,000	
1841. 1.31	湖 北	500	
1841. 1.31	湖 南	500	
1841. 1.31	云 南	500	
1841. 1.31	贵 州	500	
1841. 3.15	广 西	2,000	
1841. 3.15	湖 北	1,800	
1841. 3.15	湖 南	1,000	
1841. 3.15	四 川	数 百	

① 鸦片战争时期，一些将军、督抚、副都统在奏折中提到江宁、镇江、杭州、乍浦四城驻防旗兵之数。数字为：江宁三千五百六十名，京口（镇江）一千一百八十五名，杭州二千余名，乍浦一千八百四十一名。（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第八五七页，第四册，第一六〇四、一八四三、一九二〇页）但缺广州、福州两城。此两城驻防兵数参阅《清朝文献通考》、《清朝通典》，福州驻防含水师营约二千四百名，广州驻防含水师营约三千四百名。按《清朝文献通考》、《清朝通典》皆成书于乾隆年间，数字未必与鸦片战争时期兵数相符。但清朝军制一旦确定，更动很少，更动的幅度亦很小。鸦片战争时期江宁、镇江、杭州、乍浦四城旗兵数与《清朝文献通考》、《清朝通典》所载之数大致相同。

调往方向：浙江

表二

命调时间	调出省	兵数	调出与撤离说明
1840. 7.18	福建	500	道光帝命调时未称兵数。是年十一月十五日撤。
1840. 8.28	安徽	1,200	原调江苏，由伊里布调往浙江。是年十一月十五日撤。
1841. 1.12	湖北	1,800	是年二月十五日下令停调，三月十五日改调广东。
1841. 1.12	湖南	1,000	
1841. 1.12	安徽	1,200	定海、镇海两役后，大部伤亡或溃散。
1841. 2月	江宁驻防	300	裕谦带往，是年九月一日撤回。
约1841. 2月~4月	江苏	1,000	裕谦调，未经道光帝。浙江诸战后，损失较大。
约1841. 6月~7月	江苏	200	
1841. 9.25	江宁驻防	800	裕谦调，道光帝于十月四日认可。次年六月二十二日，撤回江宁旗兵。七月奕经派安徽兵五百往江苏，其余十月撤。
1841. 9.25	安徽	1,000	
1841.10. 2	江苏	300	裕谦调，道光帝十月四日认可。
1841.10. 2	江西	2,000	原调福建，裕谦截调，十月十一日道光帝同意。次年六月奕经派往江苏。
1841.10.12	湖北	1,000	次年十月撤回。
1841.10.12	江西	1,000	是年十月二十六日撤回。
1841.10.17	陕西	2,000	原调天津。是月二十一、二十二日仍命往天津。
1841.10.19	河南	1,000	见后批河南兵。
1841.10.21	湖北	1,000	次年十月撤回。
1841.10.26	四川	2,000	次年六至八月，奕经派往及带往江苏一千三百名，其余十月撤。
1841.11.13	山西	500	抬枪抬炮兵。次年八月奕经带往江苏二百名，其余十月撤。
1841.11.13	陕、甘	400	抬枪抬炮兵。陕、甘各二百名。撤离情况见下项。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第一一五九页；第三册，第一二三一页。

③ 各表均据《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有关文件统计，并参阅《清宣宗实录》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

表二续

命 调 时 间	调 出 省	兵 数	调 出 与 撤 离 说 明
1841.11.16	陕 西	1,000	一八四二年七月至八月, 奕经派往及带往江苏共计二千六百名, 其余十月撤回。
1841.11.16	甘 肃	1,000	
1842. 3.24	陕 西	1,000	
1842. 3.24	甘 肃	1,000	
1842. 4.16	河 南	1,000	连同前批共两千。是年六月至八月奕经派往及带往江苏一千九百十余名, 尚存八十余名十月撤回。
1842. 4.16	广 西	1,000	是年六月, 奕经派往江苏。

调往方向: 江苏

表三

命 调 时 间	调 出 省	兵 数	调 出 与 撤 离 说 明
1840. 7 月	安 徽	2,100	伊里布调, 是年九月十日派往浙江一千二百名, 其余十月至十一月撤。
1840. 7 月	江 西	1,000	伊里布调, 是年十月撤。
约1841. 3 月~4 月	安 徽	1,000	伊里布调, 是年八月至九月撤。
约1841. 10 月~11 月	安 徽	800	梁章钜调, 次年十月撤回。
1841.11.21	河 南	1,000	一八四二年十月撤。
1842. 5.28	湖 北	1,000	
1842. 6. 1	山 西	1,000	是年六月十九日改调天津。
1842. 7.30	山 东	1,000	归南河总督统辖, 是年八月停调。
1842. 7.30	河 南	1,000	归南河总督统辖, 是年十月四日撤回。
1842. 7.27	安 徽	500	牛鑑调, 是年十月撤回。
1842. 8.16	四 川	1,000	未到达, 是年九月二十三日折回。
1842. 8.16	陕、甘	1,000	归南河总督统辖, 未到达, 是年九月二十六日折回。
1842. 6 月~8 月	浙 江	9,600	原调浙江之外省兵, 由奕经派往及带往。不包括江苏调浙后又撤回兵数。是年八月奕经撤回安徽兵五百名, 其余十月撤回。

从以上三表来看,调往广东的外省兵共一万七千余名,调往浙江的外省兵最多时达一万八千四百名(奕经、刘韵柯等奏一万五千八百名,他们未将一八四一年一月十二日伊里布调安徽寿春镇兵一千二百名、裕谦自一八四一年二月至八月三次调江苏徐州镇兵一千五百统计进去),扣去从江苏调往的二千三百名,实为一万六千一百名;调往江苏的外省兵最多时达一万三千九百名,除去由浙江调去的外省兵九千六百名,实为四千三百名。总计调往三省的外省兵最高额为三万七千四百名(以上数字皆未将已下令调动但尚未到达或改调其他地区之数计算在内)。增援的外省兵,合四省原驻军,共约二十五万八千人。

上述数字表明,清军无论是总兵力还是发生战事的四省兵力,与英国远征军兵力相比,都占有绝对的优势。

三、对抗中的中英兵力对比

毫无疑问,发生战事的四省驻军和调往该四省的外省援军不可能以全数与英国侵略军直接对阵;同样,侵华英军也不可能每战都投入其全部兵力。在总体上兵力对比是一回事,而在每一战场上相搏时,兵力对比又是另一回事。每战尽可能地集中强大的兵力,这是一般的军事原则。

战斗中双方兵力强弱,是决定战斗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鸦片战争中,较大的战斗共十二次。这里,将军事对抗中英双方各自投入兵力具体数字分述于下:

一、第一次定海之战(一八四〇年七月五日) 清军在定海额设兵丁二千六百余名,而当时可用于对阵者仅一千余名^①。英军战舰五艘:威厘士厘号(炮七十四门)、康威号(炮二十八门)、鳄鱼号(炮二十八门)、巡洋号(炮十八门)、阿勒琴号(炮十门);运输船十艘;登陆作战陆军为皇家十八团一部,马德拉斯炮兵等,人数不详^②。

二、沙角、大角之战(一八四一年一月七日) 清军兵力无确切数。琦善奏称沙角炮台曾得增兵四百名^③,林则徐称英军登陆时沙角守兵仅六百余名^④。大角炮台小于沙角,守兵亦不会超过沙角。琦善又奏此战清军伤亡七百余名^⑤。据此估计,沙角、大角守兵共约一千余名。进攻沙角的英军为战舰三艘:加略普号(炮二十六门)、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第三二五至三二六页;第二册,第九四六页。

② 吉瑟林:《在华六月作战记》(Lord Jocelyn, "Six months with China Expedition" London, 1841) 第五四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第六九五页。

④ 《鸦片战争》第二册,第五六三页。

⑤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第八一七至八二一页。并参阅该书第四册,第一二九二页。

海阿新号(炮十八门)、拉呢号(炮十八门);汽船四艘:皇后号、复仇神号、马答加斯加号、进取号;登陆作战英军共一千四百六十一名。进攻大角的英军为战舰四艘:都鲁壹号(炮四十四门)、萨马兰号(炮二十六门)、摩底士底号(炮十八门)、哥伦拜恩号(炮十八门)^①。

三、虎门之战(一八四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虎门靖远等六座炮台兵丁及山后驻守雇勇共八千名^②。其中关天培镇守之靖远炮台兵弁共二百五十三名^③;威远炮台兵弁三百二十七名,雇勇九十一名^④;各炮台守兵仅数百名^⑤。山后驻守雇勇五千名^⑥。英军为战舰十艘:威厘士厘号(炮七十四门)、伯兰汉号(炮七十四门)、麦尔威厘号(炮七十四门)、都鲁壹号(炮四十二门)、加略普号(炮二十六门)、萨马兰号(炮二十六门)、前锋号(炮二十六门)、鳄鱼号(炮二十六门)、摩底士底号(炮十八门)、硫磺号(炮八门);汽船三艘:皇后号、复仇神号、马答加斯加号;运输船只;登陆作战英军为第二十六团、四十九团的分遣队,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三十七团,炮兵、工兵及大舰上的水兵、海员,人数不详^⑦。

四、乌涌之战(一八四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清驻守乌涌炮台有广东防兵七百名,湖南援兵九百名,共一千六百名^⑧。英军为战舰五艘:加略普号(炮二十六门)、先锋号(炮二十六门)、鳄鱼号(炮二十六门)、摩底士底号(炮十八门)、硫磺号(炮八门);汽船两艘:复仇神号和马答加斯加号^⑨。

五、广州之战(一八四一年五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 广州此时已到外省援军一万六千名,驻防八旗及驻守广州的督抚各标、广州协兵约一万名^⑩。英军为战舰

① 《中国丛报》第九卷,第六四八页;第十卷,第三七至四三页;伯纳德:《复仇神号航行作战记》,第二五八至二六〇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第八四三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四册,第一八七九页。

④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第一一〇一页。

⑤ 《鸦片战争》第二册,第五六四页。

⑥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第八一四页。

⑦ 《中国丛报》,第十卷,第一七六至一八三页;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转引自《鸦片战争》第五册,第一七八至一八五页。宾汉书称:“幸好士爵士和由大船的水兵和海员组成的三千人登陆”。此处三千人当误。一、从当时的作战行动来看,水兵和海员不可能组成三千人的队伍;二、幸好士一路仅伯兰汉号、麦尔威厘号、皇后号和三只小船,无法载运三千人登陆。未查到英文原书,不知原文如何。《中国丛报》称:“幸好士率领伯兰汉号和麦尔威厘号水兵组成的三百人登陆”。此说更为可信。幸好士率领的登陆部队,是数支登陆部队中的一支。

⑧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第八四五、八五四页。

⑨ 《中国丛报》第十卷,第一二〇、一七九页。

⑩ 参阅嘉庆《广东通志》卷一七四;同治《广州府志》卷七三。

十二艘：摩底士底号（炮十八门）、卑拉底士号（炮十八门）、鳄鱼号（炮二十六门）、先锋号（炮二十六门）、宁罗得号（炮二十六门）、海阿新号（炮十八门）、巡洋号（炮十八门）、哥伦拜恩号（炮十六门）、路易莎号（炮十六门）、阿勒琴号（炮十门）、硫磺号（炮八门）、司塔林号（炮八门）；汽船两艘：复仇神号和阿特兰特号。登陆作战英军为：左纵队三百六十名，进攻商馆；右纵队分成四旅，共二千三百九十五人，进攻广州^①。

六、厦门之战（一八四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清军兵力约五千余名。闽浙总督颜伯燾于战前奏称，厦门防务共部署兵丁四千五百零九名，战后怡良所奏相同，只是少报一处驻兵；颜伯燾于战后又奏称收回水陆原兵五千余名，受道光帝面谕驰往密查的户部右侍郎端华奏称，陆路原调厦门三千名，水师原调厦门二千六百八十名，共收回原兵五千三百五十六名^②。英军为战舰十艘：威厘士厘号（炮七十二门）、伯兰汉号（炮七十二门）、布郎底号（炮四十四门）、都鲁壹号（炮四十四门）、摩底士底号（炮十八门）、卑拉底士号（炮十八门）、巡洋号（炮十六门）、哥伦拜恩号（炮十六门）、阿勒琴号（炮十门）、班廷克号（炮十门）；汽船四艘：皇后号、复仇神号、西索斯梯斯号、弗莱吉森号；运输船多只；参战之英陆军包括第十八团、二十六团、四十九团、五十五团等，共计二千五百十九名^③。

七、第二次定海之战（一八四〇年十月一日） 清军包括定海镇额兵二千四百名，浙江本省调防兵二千名，安徽寿春镇兵一千二百名，共计五千六百名^④。英军为战舰五艘：威厘士厘号（炮七十二门）、布郎底号（炮四十四门）、巡洋号（炮十六门）、摩底士底号（炮十八门）、哥伦拜恩号（炮十六门）；汽船三艘：皇后号、复仇神号、西索斯梯斯号；登陆作战英军分为两纵队，第一纵队约一千五百名，第二纵队由第四十九团、水兵和海员组成，人数不详^⑤。

八、镇海之战（一八四一年十月十日） 清军包括镇海本营兵一千余名，浙江本省调防兵二千四百名，江苏徐州镇援兵一千名，收留浙江黄岩镇因定海失陷未能行动之水师百余名，收回定海战败溃兵三、四百名，共约五千名^⑥。英军为战舰七艘：威厘士厘号（炮七十二门）、伯兰汉号（炮七十二门）、布郎底号（炮四十四门）、摩底士底号

① 《中国丛报》第十卷，第三四〇至三四八页，第三九〇至四〇一页，第五三五至五五〇页；伯纳德：《复仇神号航行作战记》，第二卷，第三六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第八七九至八八〇页；第三册，第一二八六、一四五七、一五七一页。

③ 《中国丛报》第十一卷，第一四八至一五七页；伯纳德：《复仇神号航行作战记》，第二卷，第一四五至一四六页。

④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第九四六、九六二页。

⑤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转引自《鸦片战争》第五册，第二六二至二六四页。

⑥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第一一四八、一一六四页；第三册，第一二六五页。

(炮十八门)、巡洋号(炮十六门)、班廷克号(炮十门);汽船四艘:皇后号、复仇神号、西索斯梯斯号、弗莱吉森号;运输船多只;登陆作战英军分成三个纵队,左纵队一千零六十一名,中央纵队四百六十五名,右纵队七百六十七名^①。

九、浙东之战(一八四二年三月十日至十五日) 清军进攻宁波兵一千九百名,勇四百名;进攻镇海兵一千四百名,勇五百名;进攻定海为崇明、川沙、定海各处水勇义勇,人数不详。在梅墟一带策应的为各地雇勇共三千九百名。奕经统兵一千三百五十名驻曹江。文蔚统兵二千驻长溪岭,该处后遭英军的反攻^②。当清军进攻宁波、镇海、宁海三城时,受攻击英军当为全体驻在各该处海、陆军。英海军有战舰九艘、汽船一艘、运兵船一艘、运输船多艘;英陆军约二千余名^③。英军向长溪岭、慈谿一带反攻时,出动兵力为一千二百余名^④。

十、乍浦之战(一八四二年五月十八日) 清军包括乍浦驻防一千八百四十一名,乍浦绿营及浙江本省调防兵一千八百余名,陕甘援兵一千名;山东雇勇一千五百名,乍浦本地勇七百名,共计约七千名^⑤。英军为战舰七艘:皋华丽号(炮七十二门)、布郎底号(炮四十二门)、摩底士底号(炮十六门)、哥伦拜恩号(炮十六门)、阿勒琴号(炮十门)、司塔林号(炮六门)、伯劳弗号(炮六门);汽船四艘:皇后号、复仇神号、西索斯梯斯号、弗莱吉森号;运输船多只;登陆作战英军分成三个纵队,右纵队九百六十九名,中央纵队三百七十八名,左纵队八百六十三名,共计二千二百十名^⑥。

十一、吴淞、宝山之战(一八四二年六月十六日) 清军在吴淞、宝山及邻近上海一带共约七八千名,在英军重点进攻的陈化成督守的吴淞西炮台仅有兵一千余名^⑦。英军为战舰七艘:皋华丽号(炮七十二门)、布郎底号(炮四十二门)、北极星号(炮二十六门)、摩底士底号(炮十六门)、哥伦拜恩号(炮十六门)、克里欧号(炮十六门)、阿勒琴号(炮十门);汽船六艘:复仇神号、西索斯梯斯号、弗莱吉森号、伯鲁多号

① 《中国丛报》第十卷,第六二七至六二八页;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转引自《鸦片战争》第五册,第二六八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四册,第一六五七页。

③ 《中国丛报》第十一卷,第一一六至一一九页。

④ 《中国丛报》第十一卷,第四九七页;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转引自《鸦片战争》第五册,第二八〇页。

⑤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三册,第一二四九至一二五三页;第四册,第一六五五、一八一八、一八二一页。

⑥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转引自《鸦片战争》第五册,第二九一页;伯纳德:《复仇神号航行作战记》第二卷,第三一七至三一八页;《中国丛报》第十二卷,第二四八至二五二页。

⑦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第一〇七〇页;第三册,第一二八四、一三六〇、一三八七、一四四〇、一六二三页;第四册,第一九一二页。

(Pludo)、谭那萨林号(Teuassarín)、麦都萨号(Medusa);登陆作战英军人数不详^①。

十二、镇江之战(一八四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清军包括镇江驻防旗营一千一百八十三名,青州旗营援兵四百名。(城外又有齐慎统带之四川兵五百三十名,广西兵二百名,江西兵一千名;刘允孝统带之湖北兵一千名,共二千八百余名,但英军一开炮,未经接仗,便逃至四十五里外之新丰镇。)^②英军共分四旅,炮兵旅六百零二名,第一旅两千三百十八名,第二旅一千八百三十二名,第三旅二千一百五十五名,共六千九百九十七名^③。

由全国而各战区、而各次战斗,中英双方兵力对比的相距不断在缩小。从总兵力看来,清军兵力雄厚,占有数十比一、甚至百余比一的绝对优势;而到每一具体战斗时,这种优势便消失了。上述十二次战斗的双方兵力对比说明,清军除广州之战、浙东之战在数量上占了相当的优势外,在大多数战斗中,双方兵力相距不远,而在第一次定海之战、沙角、大角之战和镇江之战中,反是英军占了优势。就是在虎门和吴淞,英军至少在其重点进攻的区域中是占优势的。

仔细分析在军事对抗中的中英兵力对比,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英军每战都投入其总兵力的相当部分,这使得他们人数不多的远征军,每战都保持了一定的兵力,从而避免了兵力相差太远的困境。在战争中,他们为了发动新的攻势,甚至放弃他们已经夺占的城市。二、与此相反,清军每战投入的兵力只是其总兵力的极小部分,相对其额设兵丁的数量来说,战场上的兵力少得可怜。由此而产生疑问:为什么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四省直接参战只能是其额设兵丁的一小部分?为什么四省驻兵众多、直接参战很少而仍不敷用,需要大调外省援军?为什么外省援兵参加各次战斗的部队并不为多?这些问题归结起来也就是:清军为什么不能集中兵力,为什么在总兵力占绝对优势而在战场上不能继续保持这种优势?笔者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 关于军制

清军虽有八十万之众,但没有一支机动性强、比较集中的部队,而是分散设防于各地。八旗绿营虽为国家军队,但除了出征作战的职能外,平日担负的各种勤务差役十分繁重。这些都是清代军制的重要特点。分析清代的军制,下列五点值得重视:

1. 京师八旗和巡捕五营共十余万,但相当大部分用以执行宫廷、陵寝、衙门的

① 伯纳德:《复仇神号航行作战记》第二卷,第三五九页;《中国丛报》第十二卷,第二八七至二九四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第八五七页;第四册,第一九二〇、二一〇一、二一一五、二一一七页。

③ 伯纳德:《复仇神号航行作战记》第二卷,第三九九至四〇〇页;《中国丛报》第十二卷,第三四一至三五二页。

日常勤务。巡捕五营及一部分京营则是巡防地面，看守各城门、堆拨，维持京师治安。为了守卫京师，这些部队难以抽调。鸦片战争中，也没有动用。

2. 各将军、都统、副都统统辖的驻防八旗，相对集中，但一处不过数千，除日常官府勤务外，又有守城之责。鸦片战争中，此类兵丁调出不多。

3. 各省督抚直接辖有督标、抚标，人数不多。这些部队虽无明确的守土之责，但所担负的各种官府勤务是很繁重的。提督为一省军事首领，所辖提标虽较督标、抚标为多，但其中相当部分有守土之责。

4. 清军的主要兵力是由镇而协而营，最后以营为基础分驻各地。据《清朝文献通考》、《清朝通典》等官书，清军除在一些较大城市驻有两、三营或更多一些外，各地通常只有一营或不足一营。他们专驻一地而专防一处，守土之责十分明确。第一次定海之战时，定海镇总兵竟以其部“专管巡防洋面，无守城之责”为理由，“不肯退保城池，以致县城失陷”^①。

5. 分驻在各地的清军，不是整营整营地驻处在一起，而是分成更小的单位散在城、汛、哨、卡，多则数百人，少则数人。最为分散者，有如湖南镇筴镇，额设兵丁四千一百零七人，“分布汛塘六十七处，驻守碉卡关门哨台七百六十有九”^②。

清军布防驻守如此分散，担负勤务差役如此繁多，自有其原委。

清朝长时期是没有警察的，警察事务由军队承担。看守仓狱要地、各处值班派差、解送钱粮罪犯、维持地方治安成了清军平日的主要任务。从鸦片战争时期一些将军督抚的奏折中，可以看出这一点。直隶总督琦善在英舰抵达白河口时奏称：

“天津存兵共止八百余名，除看守仓库、监狱、城池暨各项差使外，约止六百余名。……况现值空重漕船，往来络绎，防范稽查，在在需人。”^③

盛京将军耆英称：

“……省城西额兵五千二百余名，其各项差徭繁多，在在需人。又边外卡伦，看守围场封堆等项，每年共需兵九百余名，均应按季轮流派往。”^④

福州将军保昌等称：

“省城旗绿营兵，除向例各处值班外，实存在一千零四十名。”^⑤

除此之外，就是“弹压地方”，镇压遍于全国的时起时落的人民反抗斗争。清军承担的这些任务，加上当时的交通条件造成的运兵困难，客观上要求它分散驻守。从另一方面来看，强兵悍卒始终是封建统治者的心头大患，分散布防更有利于维持其统治。龙汝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第九四六页。

② 李扬华：《公余手存》，营制。

③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第三五八页。

④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三册，第一四五七页。

⑤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三册，第一二六〇页。

霖奏山西清军时称：

“除抚标及两镇额设兵丁外，分成四十余营，再分州县之城守、汛塘，……立法之初，原以为承平无事，一则散强悍之徒，使无尾大不掉之患；一则塞空虚之防，使无照顾不及之虞。其用意至深且远。”^①

清代的军制明白地说明了清军利于分散“治民”，难以集中御外。封建统治者在制定军制时，着意于“防民防贼”，并未留有大批机动部队随时应付大规模的对外征战。清立国后历次战争，除康熙年间与俄罗斯外，皆为国内战争。此类战争的结果不是军队的集中，而是更加分散，“弹压”之军遍于全国，即所谓防患于未然。事实上，这些分散的小部队对下级官吏很有用，使他们能有一定的武力来维持其统治。西方殖民主义东来，最初引起的不是军事纠纷。西“夷”的坚船利炮肆虐于中国大地，还是第一次。

清军布防的分散和承担的任务决定了：1、清军不可能全数用于征战，清军额设兵丁同派调出征的防兵是两个不同量的概念；2、清政府调不出一支完整的部队，酌量抽调是调集兵力的唯一办法。鸦片战争中，调派的援军遍及全国，除新疆、蒙古外，各地都派出了部队。从大的方面来看，四省及天津、安徽等地所得援兵是从各省各将军都统属下数百上千地合成一军；从小的方面来看，一地援军也是从各标营汛卡数百数十甚至数人拼凑而成，没有整个建制单位全部调出的。

问题还在于，既然只能是抽调其中的一部分，那么，鸦片战争时期，在维持封建统治秩序的前提下，用这种抽调的方式，究竟能抽调出多少呢？

先看沿海数省的情况。英军在沿海各省侵扰，清政府三次下令沿海各省加强海口防务：第一次是定海失守后，而英军从天津南退后下令撤防；第二次是虎门失守后，而奕山广州战败谎报军情，再次下令撤防；第三次是厦门失守后。沿海各省从本省非交战区抽调兵力加强海口防务的兵数，可见下表：

从上表可见，沿海各省除原在海口部署之兵外，抽调非战区的兵丁最多不过占额兵的

表四

省 份	额 设 兵 丁	第一次定海失守后	虎 门 失 守 后	厦 门 失 守 后
直 隶	38,280		六千七百九十名	一万零数百名
山 东	20,057		三千余名	三千余名
江 苏	38,001	7,800名		
浙 江	37,565	7,900名	约一万名	约一万名
福 建	61,675		一万三千余名	一万五千余名

① 《整顿营务议》，《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六二。

四分之一强。上述数字可视为最大抽调兵丁之数，因为各该督抚在抽调了上述兵丁后纷纷奏称“实无一兵可调”。抽调比率最低者为山东，而山东巡抚于一八四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奏称：

“一切巡防盗贼，卫护商旅，以及催趲空重粮船，递解饷鞘人犯，在在均资兵力。今岁夷船未经北驶，故各口岸调防弁兵止于三千余名，在沿海尚形单薄，在腹地已涉空虚。……而冬令撤防之际，正内地缉匪紧要之时，沿海虚设多兵，徒令坐食，而腹地处处兵单，不敷差遣。臣通盘筹计，惟有仍循旧制，就现在额兵，择近酌调，分年换防，庶可稍节糜费而均劳逸，且于海疆腹地，亦不致有顾此失彼之虞。”^①

山东抽调兵仅占额设六分之一，就无法维持地方治安，只得调回一些来。沿海各省额设兵丁虽多而不敷用，原因正在于此。

再看内地各省的情况。内地各省因本省无战事，能够抽调的兵丁要多于沿海。鸦片战争时期，内地各省抽调兵数合计为五万一千二百名^②，占各省额设兵丁比率百分之一点二五至百分之三十六点八不等。比率高者，多为邻近战区省份，如安徽抽调援兵三千五百名，占额设兵丁的百分之三十六点八三；湖北抽调七千三百名，占百分之三十五点三；江西抽调四千名，占百分之三十一·八三；河南抽调四千，占百分之二十五·八二。其后为陕西抽调五千七百名，占百分之二十二·二八；四川抽调七千名，占百分之二十二。抽调比率较低的有下列省份：广西抽调三千名，占百分之十三·二六；湖南抽调二千五百名，占百分之九·一六；贵州抽调二千五百名，占百分之六·八一；山西抽调一千五百名，占百分之六·五三；甘肃抽调三千七百名，占百分之五·三四；云南抽调五百名，占百分之一·二五。这些省份抽调比率低，原因既不在路途遥远，湖南、广西距广东，毕竟比四川、湖北近得多；也不在于该省兵丁不够骁勇，乌涌之战，湘兵最能战，陕、甘兵丁则以技勇闻名。这是因为清政府在这些省份大量驻兵，目的在于监视当时清帝国内部的苗、蒙、回等少数民族。此外，吉林、黑龙江、察哈尔也各抽兵二千名。当然，不能认为内地各省抽兵五万余名，是清政府所能达到的最高数字。这个数字虽还能增加一些，但要数倍地增加是难以办到的。裕谦曾于一八四一年九月二十日奏称：“浙江及附近各省，业已无兵可调”^③。由此而论，安徽、江西等省最大抽调比率不过三分之一强。若内地各省皆达到这个比率，也不过再加抽调七万余名。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山西、甘肃因少数民族问题，抽调比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三册，第一五七八页。

② 除表一、表二、表三提及三省外，还有调往山海关、天津一带一万名；调往锦州一带一千名；调出安徽芜湖一千名；调往江苏尚未到达二千名。此数又未将齐慎由川赴粤所带数百名兵计算在内。

③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三册，第一二一〇页。

率还要打一折扣。京畿清军难动，东三省、各地驻防还可抽出一些。若如此，清政府不过能再抽调八万余名。

必须说明，上述调兵最大限额是以封建统治秩序不受损害为先决条件的。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因地方吏治腐败，无封建统治秩序可言，抽兵比率要大得多。衰败没落的封建统治集团不会也不可能以全部力量来对抗打着通商、赔款、割地旗号的侵略者，因为这些侵略要求并不会立即冲垮封建专制统治。而他们与被统治者的矛盾是根本对立的，他们以武力镇压的基础是建立和维持封建秩序。因此，他们宁可与外来侵略者妥协也不愿发生国内危机。他们这种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特征是由他们的阶级利益决定的。

清军落后的封建性的军制使清军束缚于各地，难以调动集中。从清军的军制来考察，就不难理解，数量庞大的军队，调兵并非易事。

（二）关于装备

除了必须握有相当数量的部队和明确的战略思想指导外，集中兵力还要求：1. 预定战场；2. 快速运兵。预定战场是为了决定集中兵力的方向、地点。快速运兵即调兵速度是集中兵力的重要保证。这两点都与装备有着直接的关联。

从当时的中外记载来看，鸦片战争时期清军使用的装备与清开国初年差不多，与英国侵略军比较，差距甚远，水师尤甚。一八四〇年八月十三日，祁寯藻、黄爵滋、邓廷桢等奏称：

“查各省水师战船，均为捕盗缉奸而设，其最大之船，面宽仅二丈余，安炮不过十门。夷船大者载炮竟有数十门之多，彼此相较，我船用于缉捕则有余，用于攻剿者不足，此实在情形也。”^①

这样的舰船无法与“船坚炮利”的英国海军相抗衡。除颜伯焄外，几乎所有清军将领都认为，若在海上交锋，是以英军之长击己之短，绝无胜利希望。因此，他们制定的战略方针基本上是一致的，这就是：收缩水师，加强沿海炮台，在陆路与英军交战。

这种被迫采用的以守待攻的战略使清军丧失了主动权，无法预定战场。英军倚仗着坚船利炮，在海上任意往来，他们决定了战争的时间、方向、规模。他们愿意在什么时候打，就可以在什么时候打；愿意在哪儿打，就可以在哪打。兵力集中十分容易。清军因无得力舰船，无法在海上主动交战，只得处处设防。英舰船一出动，千里海防线，几十个重要海口都必须加强防守。这样，经过努力而从各地抽调来的增援部队不可能集中抗敌，而只能分散到各个海口去。裕谦的话，正说明这一点：

“浙省防兵，统计虽有一万五千余名，系连各该处额设官兵请给盐菜者一并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第三六四页。

计算。实在镇海、定海二处，除去本营额设官兵外，各止调派外营外省兵三千余名。乍浦地方，除驻防八旗官兵外，止有调防兵八百余名。其余四、五千名，分防沿海各口，自一、二百名至数百名不等，本形单薄。现在逆夷四处纷扰，处处吃重，据各该地方官纷纷稟请添兵策应，固属实在情形。但奴才通盘筹画，浙江及附近各省，业已无兵可调，且该逆游魂海上，朝东暮西，飘忽不定，设我闻警调派，水陆奔驰，尚未行抵该处，而该逆又顾而之他，徒然疲于奔命，适堕其术。”^①处处吃紧、处处把守、处处兵单。浙江重要之地有三处，定海、镇海、乍浦；海口有十余处。万余援兵分散派防，各处仍不足恃。这就是说，清军每战都保持与英军相等的兵力，就得将几十倍于英军的兵力分散布置在沿海数省几十个重要海口上，而绝不能将这些兵力集中调往一地与英军决战。装备落后导致清军无法预定战场，难以集中兵力。

英军的舰船不仅是作战手段，同时也是运输手段。它能快速地开赴一地，并把陆军也运往该地。这使得英军的机动性强，兵力集中速度快，在战争中兵力重复使用次数多。鸦片战争中，英国侵略军的一些海军舰船和陆军团队几乎参加了鸦片战争的所有战役。一艘军舰使用两次等于两艘，一名士兵参加两次战斗等于两名。

鸦片战争时期清军的调动很大程度上靠步行。由于道路狭窄和船只车马数量有限，一、两千军队都不能集团行动，而要分成数起，每起二、三百人，隔日行走。装备如此之差，依靠两条腿跨越数省甚至半个中国，速度之慢不难想象。笔者据《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林则徐日记》等书，统计了二十起援兵速度，仅举几例：

1. 一八四一年一月六日道光帝命湖南、贵州各调兵一千、四川二千往广州。湖南兵五十一天后到达，贵州兵四十七天后到达，四川兵七十九天后到达。

2. 一八四一年十月二十六日道光帝下令四川调兵二千往浙江，九十六天后到达头起三百八十名，以后各起陆续到达，一百十天后未起三百名尚未到达。

3. 一八四一年十一月十六日道光帝下令陕西、甘肃各调兵一千往浙江。七十四天后到达头起三百八十名，八十九天后，未起二百五十名尚未到达。

以上仅是一些例子。从笔者所作的统计中，可以推算清军大概的调兵速度：邻省约三、四十天，隔一、二省约五十余天，隔三省约七十天，隔四省则在九十天以上。上述时间仅为道光帝下令至该兵到达为止，如果从各该将军、督抚由于战局吃紧而请求救援起算，时间就更长了。如此缓慢的调兵速度，使清军丧失了本国本土的有利条件。当时英国海军的舰船从南非的开普敦开往香港，只需六十天左右；从印度开来只需三、四十天，即使从英国本土开来也只有四、五个月。蒸汽机的使用，汽船的出现，又大大加快了英军进军的速度。璞鼎查从英国到孟买只用了三十二天，而从孟买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三册，第一二一〇页。文中“防兵”，指本省及外省调出增援的兵丁，并包括各该处额设兵丁。

到香港只航行了二十五天。由此推算,假如英侵略军在舟山派汽船到印度去调集援军和军需品,来回时间几乎相同于从四川调兵到广东或从陕甘调兵到江浙。方便快速的舰船使英军漫长的补给线缩短了,而装备落后则延长了清军援兵的路程。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清军的调兵速度,跟不上英军军事行动的展开。英军第一次从广东水域出发,攻陷定海,兵临白河,只花了三十五天;第二次从香港出发,攻陷厦门、定海、镇海、宁波数城,只费了五十三天。而清军呢?举广东战局为例,早在沙角、大角之战前,道光帝就命调兵四千,得知沙角、大角失守后又调兵八千,到五十天后虎门之战时,援兵仅到二千,一八四一年三月英军兵临广州城下,援兵开到只三千。这样的调兵速度又谈何集中兵力、抓住战机呢。再如浙江战局,道光帝接到厦门失守、浙江吃紧的消息后,便陆续调兵浙江,而到定海、镇海、宁波三城沦陷时,援兵仅到裕谦所调江宁旗兵八百名,其余什么时候到达渺无音讯。杭州将军奇明保、浙江巡抚刘韵柯焦虑万分地奏道:“惟浙省此时,无一兵可调,……历次奏调之寿春、江西、湖北等处官兵,均尚未到”,表示对战局的胜利毫无信心。道光帝阅此硃批:

“览至此,汝五中如焚,朕已洞悉。虽业有命将调兵之旨,以辰下而言,总在两月内外方能抵浙。思及此,朕焦急何堪!汝其殚厥心力,设法保守省城,定能仰邀天佑,转危为安,以待大兵之至也。”^①

君臣一筹莫展,只得坐待援军。

还须注意的是,在战争后期,战区邻近省份的军队已抽调的差不多了,如果清政府还要再抽调兵力,则须从遥远的西北和西南调,时间要在七十天以上。江宁将军德珠布、参赞大臣特依顺都曾要求调拨西安、宁夏满营救援,皆被道光帝以“道路遥远,缓不济急”而拒绝了。奕经在浙江惨败、江苏危急时承认:

“逆船乘风扬帆,虽数百里瞬息可到。我兵调拨接引,陆路则狭窄难行,水路则河狭船小,行走亦复迟滞。彼处之救兵未来,而此处之守兵已溃,其势有必然者。”

他也提不出别的办法,还是要求道光帝从陕甘再调“劲兵”二、三千,道光帝批道:“正所谓缓不济急,梦呓之谈耳。”^②

(三) 关于财政

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的财政困难,限制了战争的规模,也影响清军兵力的集中。嘉庆年间,清政府为镇压白莲教起义,前后凡十二年,耗去军费约两亿两^③。从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三册,第一三〇九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五册,第二一八七、二一八九页。

③ 《清史稿》食货六。

此清政府的财政陷入危机。道光年间,财政收入常不足额。道光十九年六月初七日(一八三九年七月十六日)据户部查明,“积年渐久,延欠频仍,综计欠解银数,除盐务悬引未完及帑利等款,准其分别展缓外,其余拖欠有二千九百四十余万两之多”^①。这个数字是非常大的,约占当时清政府一年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三。一八四〇年的国库存银,从雍正、乾隆年间的六、七千万两下降到一千零三十四万九千九百七十五两,次年又减少百分之四十四,为六百七十九万六千零三十七两^②。

财用匮乏对调兵行动影响极大。清军的调动,用费浩繁,这些费用,主要有三项。1. 整装银(出征营伍整顿行装费),按《钦定户部军需则例》规定:调派京营满洲出征,官弁整装银按俸一年或两年,兵丁整装银四十两;东三省满营,官弁银八十两至三百五十两不等,兵丁三十两;各省驻防满洲、蒙古,官弁按俸一年,兵丁十两至二十两,各省绿营,官弁按俸一年,兵丁六两至十两。2. 盐菜口粮(盐菜银为出征官兵的菜金),按《钦定户部军需则例》,官弁按品级大小,每员每日支盐菜银一两五钱至十二两不等,兵丁则满洲每月二两五钱,蒙古一两五钱,绿营一两三钱;口粮则不论官兵,每人每日支口粮米八合三勺。官又可按品级大小,每员随带跟役二名到六十名不等,兵丁为满洲、蒙古每两名合给跟役一名,绿营每十人合给三名。跟役每名每月支給盐菜银五钱(绿营军官之跟役不支盐菜),口粮米与官兵同。3. 车船行粮路费等银^③。这是一笔巨大的费用。仅广东一省,从一八四一年二月十四日到一八四三年三月十六日这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就花去战费三百九十万零二千八百七十九两。此后留外省官兵四千八百四十员名,调本省官兵二千六百七十员名,再雇勇二万六千名,每月需银十三万九千二百两^④。整个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共花战费约二千余万两^⑤。

① 《清宣宗实录》卷三二三。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清代钞档。转引自彭泽益:《论鸦片赔款》,《经济研究》,一九六二年第十二期。

③ 《军需则例》对此亦有具体的规定。就规定而言,很难得出实际概念,此举一例:一八五六年盛京过境吉林、黑龙江官兵、余丁“共一千八百三十员名,所需车价银二万三千二百三十七两五钱,骑马草粮银三百两,尖宿饭食银三千三百七十六两三钱一分九厘,统计需银二万六千九百十三两八钱一分九厘。”(盛京将军庆祺等奏,咸丰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宫中档》咸丰六年第十二号,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兵数不到二千,过境仅止一省,应付即如此之巨。数万大军,横越数省,费用不难想象。此虽鸦片战争之后的事情,亦可供参考。

④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四册,第一七一九页。

⑤ 关于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所花战费,众说不一。魏源称七千万两(《道光洋艘征抚记》);《清史稿》食货六中称一千数百万两;陈庆镛在道光二十三年四月初四日上奏称:“此次各海疆动拨银两报部者,已不下二千万两,现在截销,尚有陆续补报等项。”(《循经堂类稿》卷一)按,陈庆镛曾任户部主事、员外郎,上奏时任江南道御史,其说较为可信。

部库支绌，军费浩繁。鸦片战争已与康、乾年间的征战不同。征调之际，统治者不得不认真考虑用费。财政困难是导致道光帝忽战忽和的重要因素。因此，统治者总是尽可能地少抽调一些兵丁，尽可能地晚一些抽调。缓慢的调兵速度并未使清政府提前准备，在战前两、三月将援兵调赴海口，使援兵能不误战机；一旦战局有所和缓，道光帝就下令撤防。一八四〇年九月二十九日道光帝获悉白河口的英舰队已退过山东洋面，便不顾英军仍霸占定海，且大批集结于广东海面，下令沿海各省撤防。在道光帝的命令下，苏、浙、粤等沿海省份纷纷撤军，林则徐也被迫将驻守虎门的兵勇裁撤二千名。三个月后，广东局势日趋危急，道光帝只得再下令加强海口防务。一八四一年七月二十一日，道光帝在接到奕山所谓“洋务大定”的假报告后，第二次下令沿海各省撤防。山东、直隶、奉天等省遵令裁撤防兵。而裕谦接到两广总督祁埭的咨文，得知英军“有新到兵船、火船，一俟齐集，即赴浙江”，向道光帝要求江苏、浙江两省调防兵缓撤，结果遭到驳斥，道光帝批道：“不必为浮言所惑，以致糜饷劳师”^①。一八四二年九月道光帝得知和议已成，便命北方撤兵，次月，沿海七省形成撤兵的高潮，所有外省及本省调防兵在此时都奉命撤回营伍。而在此同时，英军只是退出长江，逐步南下香港，军事威胁并未解除。从道光帝和各将军督抚的言论来看，这三次撤兵的目的只是一个——“以节糜费”。

四、结 论

从兵力总数来看，清军比英国远征军多几十倍，在战争初期，多达百倍，但它驻防分散，机动作战能力差，兵力集中十分困难。鸦片战争时期清军调兵总数仅占其总兵力的八分之一左右（包括沿海、内地各省抽调支援海口的兵力），已经使清政府花费了很大的气力。清军的军制、装备和清王朝的财政困难，又使清政府难于再及时抽调大批军队应战。从地理上的距离来看，英军远离后方，自然给兵员补充造成种种困难，但清军因装备落后和交通条件恶劣，使它面临的困难甚于英军。这样，在总兵力上占绝对优势的清军到实际作战时，就难以保持其在兵力上的优势，甚至还处于劣势。

清军是一支封建性的装备落后的军队。它对付揭竿而起、组织涣散、缺乏作战经验的人民反抗斗争颇有经验，而与西方资本主义的近代化的军队较量还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军在兵力上从优势到失去优势，英军兵力虽少而在作战时并不处于劣势，正展示了落后的封建性的军队同近代化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军队之间的巨大差别。我们在探索清军如何丧失兵力上的优势时，可以看出腐朽的封建政治制度和落后的封建经济正是最终的根源。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第一一二七、一一二九页。